

考古中国

30万年前的木器揭秘远古盘中餐

高星

民以食为天,远古人类更是如此。在没有金属工具、不会种植五谷杂粮和饲养家畜家禽的洪荒时代,我们的祖先如何获得食物?享用了哪些食品?考古界一直在破解这道难题。考古人从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挖掘出的大部分遗物都与人类的食物有关:尖锋利刃的石器是人类猎杀动物的工具,与石器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多是人类肉食的残留,简易的火塘是人类烧烤食物的遗迹。我们的祖先仅仅依靠肉食存活吗?显然不是这样。民族学资料告诉我们,处在原始状态的族群大多采用狩猎与采集相结合的方式获得食物,而且采集食用可食性植物往往比狩猎更重要。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腐烂,难以形成考古遗存,所以学术界对于远古人类食用了哪些植物食材,用什么方法获得这些植物食材,经常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境地。一项新的考古成果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曙光。7月4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题为《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的研究论文,描述了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甘棠箐遗址于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两个野外季发掘出土的一批保存完好的木器,以及与其伴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这批珍贵的考古材料首次全方位揭示出远古人类食谱的秘笈。该遗址位于抚仙湖畔,在饱水的环境下埋藏了大量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前者包括加工成特定形态的木器、树木枝杈等,后者含多种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种子,还有孢粉类微小植物化石。如此丰富、保存完好的木器和

其他植物遗存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在世界范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难得一见。难以想象,该遗址出土的植物果实和种子达数万粒。已被识别出54个属,包括木兰属、构树属、山矾属、悬钩子属、葡萄属、花椒属等。孢粉分析辨认出至少70个科的植物,以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及蕨类等喜水植物占优。遗址出土的大型哺乳动物以鹿类为主,其他种类包括剑齿象、巨獭、犀牛等,还有丰富的小型哺乳动物及龟类、鸟类化石。这些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繁多,是理想的古人类栖居地。甘棠箐遗址保存的动植物遗存,揭示了古人类盘中餐中广谱型的食物种类。大量食草动物、慢爬性小型动物化石的富集,以及一些哺乳动物骨骼上的石器切割痕迹,表明狩猎和食用已是当时人类的惯常行为。更难能可贵的是遗址保存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悬钩子浆果及葡萄、飞龙掌血属等植物的果实。此外,草本植物(蕨科、商陆科、葫芦科)及蕨类的茎秆和叶片亦有食用价值。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等水生植物除了叶片、种子可以被采摘食用,富有营养成分的地下球茎与根茎可从湖岸浅水淤泥中掘取享用。在没有镐、铲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生活在甘棠箐遗址的古人群是如何将埋藏于地下的可食性植物根块挖掘出来并加以食用?遗址出土的木质材料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古人类制作和使用木器。在该遗址发掘出土的近千件木质

材料中,35件被鉴定为人类加工的木器。这些木器主要用松树制作,器身挺直光滑,一端或两端被加工成尖状,尖部形态包括凿型、铲型、锥型等。其中两件为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独特的钩状尖刃,可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研究团队开展了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肉眼观测和微痕分析表明,其中19件木器保留明显的因砍枝造型和削锐尖部而留下的刮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使用所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一些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从其上提取到植物淀粉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针对这些木器的模拟实验表明,此类木器可以用简单石器加工出来,并可有效地用来挖掘植物的根茎。甘棠箐遗址在得天独厚的埋藏条件下保存了丰富的木器、石器、骨角器及动物化石、植物遗存,描述了一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生活在抚仙湖岸的古人群携带特制木质挖掘棒前往生长着可食性植物的区域,挖掘采集富含淀粉等营养成分的下块茎类植物。这种行为方式表明,中更新世(距今约77万—12.8万年)时东亚古人群已具备对可用资源的认知、前瞻和计划性,能为预期任务专门制作适用的工具,熟练可食性植物的种类,并能精准掌握各类植物的可食部位,预判不同季节可食植物的分布。该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富含营养的植物根茎在早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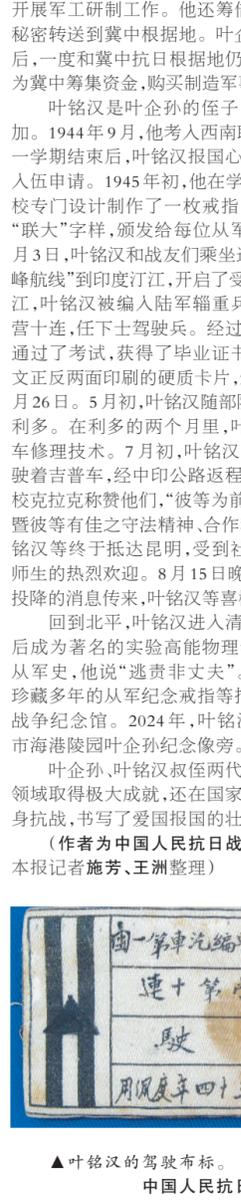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部分木器上的加工痕迹。高星供图

以物鉴史

「逃责非丈夫」——两代科学家的抗战故事

陈量

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中,观众可以见到叶铭汉的从军纪念戒指,1945年在蓝姆伽训练处汽车学校的毕业证、1945年在陆军辎重兵编汽车第一团四营十连的驾驶布标,这些国家一级文物见证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知识分子或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或是改学军事,甚至直接参军奔赴前线。叶企孙、叶铭汉叔侄两代科学家,先后投入抗战洪流,堪称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清华大学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负责帮助清华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资产。当时吕正操率领的八路军正在开辟冀中根据地,急需军事技术人才。吕正操托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地下党员张珍征求抗日知识分子到根据地从事技术工作。张珍找到了叶企孙的得意门生熊大缜,叶企孙原想留下熊大缜协助教学工作,但是被熊大缜的爱国热情感动,同意他前往冀中。叶企孙联络、动员、举荐了许多技术人才奔赴冀中根据地,开展军工研制工作。他还筹措了大量资金、物资,秘密转送到冀中根据地。叶企孙到西南联合大学后,一度与冀中抗日根据地仍保持着联系,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叶铭汉是叶企孙的侄子,自幼对叔父崇敬有加。1944年9月,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第一学期结束后,叶铭汉报国心切,寒假时便提交了入伍申请书。1945年初,他在学校加入了青年军,学校专门设计制作了一枚戒指,戒指表面刻有红色“联大”字样,颁发给从军学子,以作纪念。2月3日,叶铭汉和战友们乘坐运输机,从昆明经“驼峰航线”到印度汀江,开始了受训、服役生活。在汀江,叶铭汉被编入陆军辎重兵编汽车第一团四营十连,任下士驾驶员。经过艰苦的训练,叶铭汉通过了考试,获得了毕业证书。证书是一张中英文正反两面印刷的硬质卡片,颁发日期是1945年3月26日。5月初,叶铭汉随部队从蓝姆伽乘坐火车到利多。在利多的两个月里,叶铭汉等又学习了汽车修理技术。7月初,叶铭汉随部队离开利多,驾驶着吉普车,经中印公路返程归国,随行的美军中校拉克克称赞他们:“彼等为前所未见优良驾驶员,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7月18日,叶铭汉等终于抵达昆明,受到社会各界和西南联大师生的热烈欢迎。8月15日晚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叶铭汉等喜极而泣。回到北平,叶铭汉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后成为著名的实验高能物理学家,对于这段抗战从军史,他说“逃责非丈夫”。2010年,叶铭汉将珍藏多年的从军纪念戒指等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24年,叶铭汉去世,安葬于上海海港陵园叶企孙纪念馆旁。叶企孙、叶铭汉叔侄两代科学家,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极大成就,还在国家危亡的关头,积极投身抗战,书写了爱国报国的壮丽篇章。(作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本报记者施芳、王洲整理)



▲叶铭汉的驾驶布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新中国新疆考古拓荒者

杨雪梅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古墓沟遗址的草编小篓、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文书……这些陈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串起了这一文明碰撞交汇之地漫长的演进轨迹,勾勒出曾经生活于此的不同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变奏——王炳华就是发现这些文物的考古学家。近日,王炳华的追思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90岁的人生,40多年的新疆考古,天山内外,南疆北疆无不留他的足迹。5次进入楼兰,连续7年主持中日合作的尼雅遗址的调查发掘,主持或参加的重要考古工地达20多处……《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是王炳华去世前在三联出版的一本手记。在书的前言中他说,前40年工作的基本特点,是行脚新疆的戈壁、荒漠,到过许多人想到而难以到达的高山、深谷和沙漠中废弃的绿洲,直接体察、感悟到新疆大地的沧桑变化。“所谓‘瀚海行脚’就是要走,这些地方你不走,就没有感受,只要走,就不会白费劲。走过之后,再和文字资料对照起来,历史就通了、活了……”



▲王炳华(左)陪季美林(中)和任继愈在交河故城。王炳华之子王樾供图

1960年,25岁的王炳华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志愿去新疆考古。在那个年代,从北京到新疆至少得4天以上。“从北京坐火车只能到兰州,再转乘慢车进入新疆,当时的火车终点站在吐鲁番东部的鄯善县。天刚放亮的早晨,在戈壁滩下车,看到一排排帐篷,帐篷前立着不同单位的接站标志,一旦对接上,立刻就有热气腾腾的早点。”王炳华曾向我形容初到新疆的日子。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墓地留下了王炳华最早的考古印迹。伊型河流域的土墩墓、阿勒泰地区克尔木齐的石人石棺、哈密的五堡古墓地……经过那些艰苦的开拓岁月,王炳华迎来了新疆考古的新阶段。重新进入罗布泊,寻觅楼兰古城,发现全新的古墓沟文化,新疆考古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1988年、1990年至1997年间,由中日有关专家共同组成的“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先后对170多平方公里的尼雅遗址进行了9次预备考察和正式考察,每次发掘在半个月至三个月不等。作为亲历者,他称这一段是尼雅古国考古的黄金时代。每年的10月,30余名基本固定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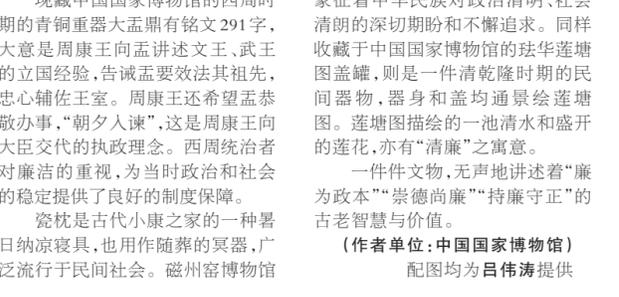
古人员就会赶往民丰汇合,每年也有一些研究古文字、历史、地理、佛教史、古代丝绸的学者加入,再加上后勤保障人员,也是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平日里无人问津的当地招待所立刻就会爆满,由于要购买大量的蔬菜、睡袋、帐篷、烤肉烤馍的无烟煤,民丰的居民也就知道了考古队员要进入遗址了……1995年的考古工作收获最为丰硕,毫无异议地成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尤其是发现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出土命名名为尼雅古墓群8号墓,现出大批珍贵文物,包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在终于找到魂牵梦萦的小河墓地后,2005年,王炳华离开了需要更好体力支撑的野外舞台,将毕生在新疆田野考古所想所思,带到学校,带上讲台,传授给广大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语言研究所当教授时,他的课最受欢迎。“每次上课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整理各种考古图片、考古笔记,学生们特别爱听。愈是这样,下一次听课的人就更多。”王炳华的晚年一直沉浸于西域研究。“凌晨、深夜,活跃的大脑中,不时还会抓取到西域历史文化的点滴闪光,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这一熔炼、萃取的考古文化工程,至今仍未见穷期。大概总得到不能思考的那天,才能最后止息吧。”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乐此不疲。他留下了各类著作27册,包括《交河沟西》《古墓沟》等考古报告,《沧桑楼兰》《精绝春秋》等科普丛书,还有大量充满真知灼见的文章。他曾说,“从事新疆考古与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定要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在一起,考古发现为传世文献提供了历史实证,而相关的文献记载又是对考古发现进行研究的史料基础。”直到2024年,王炳华还有多篇论文发表,包括《高昌三题》《难忘李征》《深心托素素 倏忽六十年——记黄文弼先生一封谈新疆考古的长信》等。如今记录着他走遍新疆所有考古现场、“有过遗憾,但更多的还是种种无法尽说的愉悦与欢乐”的考古日记和研究文稿都捐赠给了新疆师范大学的黄文弼研究中心。他和自己敬仰的前辈、新疆考古的开拓者黄文弼一样,用自己的探索勾勒出清晰的学术地图,引领着无数的后来者。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赵抃入蜀”图长方枕。

从先秦时期监察制度的萌芽,到历朝历代清廉官员的风骨,再到社会各阶层对廉洁风尚的推崇,文物带领我们全面感知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发展。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四十二年迷鼎,共有10件,其中8件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单篇316字。铭文为我们还原了2800多年前的一场隆重的册命过程,通过繁复的仪式,单遂被周宣王任命为官司历人。同时,铭文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任前廉政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周宣王对单遂提出了四个告诫:一是施政办事要谨慎,不能贪图安逸,放纵自己;二是要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依法行政;三是审理案件要明辨是非,不偏不倚,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四是要廉洁自律,不得以权谋私。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内涵丰富,可以看出周宣王对官员廉洁从政的期待,也反映了我国的监察制度在西周时期就已有雏形。“廉者,政之本也。”追溯我国廉政监察制度的渊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从秦代设置的御史大夫开始,殊不知中国的监察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萌芽。2000多年来,“清廉”始终是为官施政之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大盂鼎有铭文291字,大意是周康王向孟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孟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周康王还希望孟恭敬办事,“朝夕入谏”,这是周康王向大臣交代的执政理念。西周统治者对廉洁的重视,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瓷枕是古代小康之家的一种夏日纳凉寝具,也用作随葬的冥器,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磁州窑博物馆

收藏的一件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赵抃入蜀”图长方枕,勾勒出千年前的一段美谈。顾名思义,枕枕的主题纹饰为“赵抃入蜀”图,讲的是北宋名臣赵抃清正廉洁,入蜀上任时仅携带一琴一鹤的故事。此图出现在日常器具上,表现了百姓对于清廉官员的怀念和崇敬。赵抃一生为官四十五载,其中在京师约6年。在担任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参知政事等职务时,先后向皇帝呈上175篇奏章,针砭时弊,有“铁面”之称。他勇于直言,刚正不阿,弹劾过众多朝廷重臣。赵抃曾任职多地,以4次入蜀“尤为世所称道”。那时,西蜀地处偏远,奢靡腐化之风盛行,为扭转此风,赵抃赴任蜀地,轻装简行,仅以一琴一鹤自随,时人称其“琴鹤清风”。宋英宗曾用“中和之政”来评价赵抃在蜀地的治理成绩。赵抃带去的“一琴一鹤”,涵养了他一身浩然正气。文物不仅诉说着古代廉洁官员的故事,也体现了历代对廉洁文化的追求。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海晏河清尊,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宫廷陈设用器,外壁施霁青釉,下腹近底处凸雕莲瓣和莲实纹,肩部塑一对白釉熊形耳。此尊精美绝伦,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深切期盼和不懈追求。同样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珐华莲塘图盖罐,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民间器物,器身和盖均通景绘莲塘图。莲塘图描绘的一池清水和盛开的莲花,亦有“清廉”之寓意。一件件文物,无声地讲述着“廉为政本”“崇德尚廉”“持廉守正”的古老智慧与价值。(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配图均为吕伟涛提供



图①为西周时期的四十二年迷鼎。图②为清代乾隆年间的海晏河清尊。

指尖上的美丽山河

韦康亮(广西来宾市)

我一头一回看见壮锦,是在南宁的一条老巷子里。太阳晒得很,白花花的日头晒得青石板都泛着刺眼的光。我本是想寻个阴凉处歇脚,却叫一家铺面檐下挂着的物料绊住了脚步——那是几幅五彩斑斓的织锦,随风飘扬,活脱脱像一群展翅的凤凰。店主是个50来岁的壮家阿姐,她指节处结着厚厚的茧子,手指却出奇地灵巧,在织机的丝线间翻飞如蝶。我盯着壮锦出神,她便停住织机上的活计,迎了上来:“小伙子,看得懂这花纹不?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故事哩。”我凑近了瞧,那些交织的丝线里果然藏着玄机。靛蓝的底子上,金黄的纹路由时而盘曲如蛇,时而舒展似云,间或冒出几朵朱红的花苞……阿姐的指尖点着图案:“这是几何纹,形似山川河流;这是凤凰纹,如凤凰展翅;这是万寿纹,祈愿福寿延年……”我听得出了神,顺势就坐上吱呀作响的竹凳。阿姐双脚踩着踏板,手臂张开又合拢,像在拥抱整架织机。那些五彩丝线在她手中变成会流动的溪水,顺着竹筒的缝隙缓缓流淌。最神奇的是她根本不用看图样,所有的花纹都刻在脑子里。阿姐从织机底下摸出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各色丝线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纸页上画着密密麻麻的图案。“这是我自创的新花样,有桂林山水,还有铜鼓上的纹样……”阿姐说。这真是指尖上的美丽山河,这样的非遗值得代代相传。

说说我家乡的非遗

王心源

所谓韧性保护体系,就是一套能够具有快速反应和弹性调适的文化遗产保护、风险管理与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使文物在面对气候变化、外部冲击时,能够迅速进行弹性调适,管理者能够快速实行预警或者采取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已成为文化遗产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气候变化一方面表现在气温、降水等平均值在较长一段时间的变动,另一方面表现在气温、降水等变率的变化,亦即地区有不同的气候特征,不同材质(土、木、砖、石等)的文化遗产,不同材质的文化遗产面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会有不同的反应与韧性。我国80%以上的遗址本体为土质,尤其在西北地区现存大量的土遗址。开展不同材质、不同地区的文物韧性研究迫在眉睫,有区别、有重点、有针对性开展文物保护对策,特别要关注土、木质材料的文物对于气候变化的反应。由于历经风雨与岁月洗礼,文物的老化、劣化、糟朽不可避免,本体不同程度地在损毁。文物修复使其恢复原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需要增强文物本体的抗外部冲击、抗侵蚀能力。今天的对“症”下“处方”(修复办法),更强调在修复前对文物进行精细的科学探测、检测、研究、评估以及多种修复措

施的配套。仅仅“修旧如旧”还不够,还需要“修旧固本”。有的文物遭受的损毁,是由于周边环境突变引起的灾害所致。因此,周边环境保护要与文物保护一起重视起来。很多古建筑与其周边环境是一体化的,文物本体是属于赋存环境之中的,加强对文物赋存环境安全性的研究已经是共识。当前,技术对于保护不再是限制条件,但技术应用与文物保护“两张皮”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需要对文物的价值、特性与属性有充分的认知,才能充分利用技术实现对文物脆弱化、劣化的早期诊断,实现对于文物的有效监测,提升文物在灾害来临时的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防险与避险能力。韧性保护体系的目的是实现文物在面对外部冲击后最大化的自我治愈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一种更为科学、系统的防护体系,它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事发时的“抢救性修复”转向事发前的“适应性维护”,这需要我们加强学习,提高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能力。在技术上,需要整合现有的文物保护数据与系统,建立跨领域的协作平台,在统一规范标准下实现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各环节目标的协调一致。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杨雪梅 王璠